

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

周 怡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and discusses western sociological theories and research about poverty in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Structural explanations focus on how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produce and reproduce poverty; cultural explan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approach poverty problems from the viewpoints of poverty 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analyzing such underlying factors as social anomie, absence of values, inconsistency between expectation and reality, tensions out of broken promises, discrimination, social isolation and exclusion. Comparing the two perspectives, 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when poverty is structurally produced and reproduced, cultural factors become important in either reinforcing or reducing poverty. Thus, the paper is intended to show that these two sets of explanations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while structural explanation fails to fully account for poverty, it is cultural explanation that shows its interpretative power.

选题的理由多半来自阅读：阅读现实和阅读文献。阅读现实时，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转型已经掀起了一轮新阶级的涌动：人们热衷讨论的“新中产阶级”、“新管理精英”诞生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城乡新贫困群体——城市农民工、下岗工人和那些因制度变迁而越发贫困的乡村贫困人口——也作为新阶级相继出现。然而目前有关贫困的社会学解释相当乏力，多是围绕贫困线的讨论，或是一些经验层次上的描述与对策性的实际操作性文章。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贫困的理论纷争就已十分激烈，尤其是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的对垒，已经将原本尚属政府行为的政策学贫困研究纳入了理论轨道。走进理论，我们才有入世（入贫穷世界）的感觉，梳理、归纳和评价这些理论，并将它们借鉴到转型中国的发展实践，这是这篇文章选题的初衷和目的。

本文将沿结构和文化两个面向，对现有的贫困研究作一系统的综述和评价。力求在“综述”中透析贫困研究随社会发展从经验迈向理论的路程；在“比较”中阐释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异趣及其关系，以期为社会学的贫困研究提供新思路。

结构取向的解释

不平等：社会力制造的贫困

制度造成贫困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比如，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一无所有。这就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形成了支配和被支配、压迫和被压迫的生产关系。在

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贫困化。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马克思,1972:380),工人将愈面临严重的失业贫困。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英国有“圈地运动”造成数以百万无家可归者的贫穷;美国有“种族歧视政策”下的有色人种的穷困潦倒;中国有“剪刀差”下的农民的穷困……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悟,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不当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进而导致贫困。奥科克首先指出,“从政策决定问题的意义上来看,贫困的界定通常取决于应对贫困的各项政策,于是政策和贫困就好像学术圈内存在着的‘鸡和蛋’的谜面,理解贫困首先就要去理解政策”(Alcock, 1993:4)。我以为,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政策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即“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其二,政策可能再造贫困。后一层意思又可让我们具有两种可能的想象空间:(1)解救贫困的政策因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2)政策本身就不是平等之策。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谁决定政策?如何实行政策?谁就对决定人们在社会体系里的生活环境(包括贫困状态)起重要作用”,因为“政策行为随时准备或时刻能够左右社会结构”(Alcock, 1993:13)。类似的论述也体现在文森特(Vincent)对20世纪英国贫困史的讨论中,他说,贫困和政策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穷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穷人是由那些反映贫困的经济政策创造和再创造的。因此,在文森特看来,治理贫穷状况的政策的历史,就是贫困本身的历史。而马克格拉杰(MacGregor)则从政策失误导向不平等,尔后产生贫困的角度去说明自己的观点:如果政策是政治家决策的产物,贫困就相当一个政策概念。

群体间利益的争夺是遭遇不平等和贫困现象的根源,这是冲突学派的贫困观。冲突学派认为,不平等和贫困是社会各群体之间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争夺有限资源的结果。每一个不同群体在任何一种生存与发展的竞争中都倾向于为自己争夺更多的利益,但是由于各个群体所拥有的权力和占有的资源不等,也由于能够给予争夺的资源总有短缺,利益争夺的结果必然是出现不同群体间利益的不平等分割,进而使部分群体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伦斯基在他的《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一书中说,贫困者之所以陷入贫困,主要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很少。具体而言,穷人在经济领域里缺乏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因而难以获得较多的经济收入。在政治领域里他们缺乏政治活动的参与能力和机会,因此不可能对决策、投票等产生实际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穷人无力于影响教育、传媒和社区组织,他们普遍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总之,是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不合理,迫使社会部分成员“失能”而陷入贫困或长期陷于贫困。其结果往往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和偏见,加剧了社会矛盾(Lenski, 1966)。

与冲突论的观点相比,功能学派在指认不平等现象存在的同时,并没有任何想要消除它的意愿。相反,功能论者的信念是:大凡某种社会事实屡禁不止,就一定有它不能不如此的社会功能。不平等或贫困现象就是如此。功能主义贫困观的基本视角是,贫困乃社会功能之需要。其中,最具代表的为美国学者甘斯(Herbert J. Gans)有关贫困的诸多论述。他主张,社会不平等是由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需要共同决定的。这种理论首先假定社会中各种职位在实现社会价值目标中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同时假定个人的天赋和努力程度也不同。社会为了有效地达到其主要的价值目标,就需要一些天赋优秀的人去担当较为重要的角色。为了吸引天赋高者去占领这些更重要的社会位置,并使其充分发挥才能,就必须赋予这些位置较高的报酬。同样,那些对实现社会主导价值目标的重要程度不高的职位,社会所提供的报酬就较低。

甘斯还估价了贫困所具备的社会正功能,即对社会整体的运行和发展起到某种积极作用。譬如,穷人可以去承担社会中较为低下、肮脏的工作;穷人为劳动市场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也间接促进了职业者的劳动积极性;穷人的消费,延长了一些商品的经济使用寿命;穷人可以成为社会变迁和经济增长的代价等等(Gars, 1979: 275—289)。总之,不平等和贫困的存在,在甘斯等功能主义者眼中,乃情所必至,因为社会需要它们“调色”。

失业:经济力制造的贫困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一个人是否有工作、是否能获得自己喜爱或合适的工作,以及工作报酬的高低等都经常取决于经济力——市场结构中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贫困是个人的选择行为和市场调节的结果。就像亚当·斯密所说,贫困是由经济体系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人口的生育情况共同决定的。依靠工资维持生计的工人,其所获工资是他劳动的基本价格,即维持工人及其家庭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在市场中,工人的实际工资为劳动的“市场价格”,它是随市场劳动力的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的。当劳动力供大于求时,劳动的市场价格会低于其基本价格。此时,劳动报酬降低,部分工人会因此而陷入贫困。而贫困又会使劳动者的供养能力降低,从而抑止人口的增长,减轻劳动力的过剩,使经济复苏,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劳动的市场价格上升(亚当·斯密, 1972: 73—74)。显然,斯密认为,贫困是市场情境中劳动力供需关系波动的结果。他提醒我们注意的一个社会事实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变动而产生的贫困是不可抗拒的。

经济力不可抗拒的社会事实还可以用另一个社会事实——反贫困政策失败——来加以说明。奥科克在考察 20 世纪 30 年代、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三次世界经济不景气时期出现的,由大量失业导致大幅度贫困现象的案例后指出:“失业、低工资、早退休、高税收等引起了贫困,因此,国内外各种各样经济力量的变化都可能而且正在引起贫困,这类经济力量的影响不得被归属到宿命论者的悲哀之中,因为几乎任何政府、任何政策都无法真正抵御或改变它。”我们永远不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将来这些经济力不会被修正,但至少现在“政策意愿和经济力的互动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因为经济力是导致贫困现象的原因”(Alcock, 1993: 32)。很多反贫困战略的失败往往都因为它们不敌一些或然的也可能是必然的经济力。在这层意义上说,任何解救贫困的政策措施都好似建立在漂浮不定的沙滩上。对此,有人干脆模仿功能主义的说法,赋予它合法之地位,这就是“市场需要贫困”。换言之,市场为了有效地运作,需要相当一部分穷人徘徊于市场的边缘。贫困者的等待与徘徊,会以一种无形的压力,作用于在职的工人,鼓励他们勤勉工作、克服懒惰(Novak, 1988, 转引 Alcock, 1993: 33)。

按是否拥有职业,可以把穷人分为两类:失业的穷人和工作的穷人。针对工作的穷人,美国学界有所谓“利益均沾论”。该理论假设:经济增长能有效地抑制贫困。安德森(Anderson)在 1964 年发表的《利益均沾:经济增长和美国家庭贫困的程度》一文中指出,经济增长有助于减低贫困的发生。在后续的研究中,人们根据安德森的理论,归纳经济影响贫困率高低的主要理由为:经济繁荣,劳动力市场紧俏,此时雇主少有余地去选择他们雇用的人,穷人尤其是有工作能力的穷人就容易找到工作,而工作的穷人也会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进而摆脱贫困。人们称这种现象为“利益均沾经济”,并且视这些穷人为成功的政府财政政策的得益者。遗憾的是,这一论点并没有在经验层面上被认证。事实是,在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利益均沾”的经济现象并没有发生,贫困率并没有就此降低。为什么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威廉姆(William, 1983)指出,这种事实说明,并非每个人皆能在利益均沾的过程中获益。具体而言,当

经济领域发生了从传统的制造业向服务业、信息业的结构变迁后,威廉姆认为,美国的经济呈现出三个阶段:大众生产阶段、超大众生产阶段和大众消费阶段,每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本性都赋予穷人一个完全不同的雇用关系。总起来讲,这些阶段性变化成全了“自动化、钢铁、消费电子产品工业中的高收入工作的欠缺”,穷人不是缺乏工作,而是缺乏技能去承担这些高收入的工作(Kelso, 1994: 226—246)。大量“微卑工作”涌现,壮大了穷人的队伍;又有相对“高精尖的工作”创造了“高收入”的富裕阶层。愈来愈明显的两极分化,愈来愈壮大的穷人队伍,突显在经济发展之后,这不能不让人再度触碰到经济力的谜幻。经验报告对这种谜幻的答复是,经济增长并没有改变贫困,经济成长与贫困率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

分析与结论

社会力和经济力对贫困的结构解释各有侧重,但它们都是悲观地看待结构:结构是具有无法满足全人类需求的架构。明确地说,几乎结构的方方面面,都会引起和制造贫困,而且结构的调整不能真正解救贫困。

结构的“悲观”反映在两个方面:(1)实际操纵结构的智者,像每一个结构解释那样,往往仅注意结构条件对发展的某一方面的限制,注意到引起贫困的某方面原因,而忽视结构整体,忽视结构具有联系的方方面面。因此,每一个理论、每一个在理论之上建立起来的具体的脱贫举措,都经常是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譬如,利益均沾论的局限在于,它仅着重市场中报酬的多寡问题,而没有考虑家庭收入的其他来源。于是,劳动力市场的报酬就成为政策注视的目标。(2)社会转型时确实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空间。在上述结构解释中我们看到,社会力和经济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贫困,但两相比较,前者似乎更多人为的因素;后者则多少归诸于或然的、具有人所无法预计的种种可能性。人可以凭借社会力发展经济,创造自己的富裕;人也可以运用社会力剥夺他人的权利,有意制造贫困。但是,人却不能真正主宰经济力。这种无能,表现在诸多的欲速不达、事与愿违的发展结果中,譬如,原本抑制贫困的种种政策却无意间引发出贫困加剧的局面。因此可以说,社会力在改造经济、发展经济的同时又受经济力之约束。

谈或然性的时候,其实也包涵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事物的发生、滋长和消亡都不会沿着绝对笔直的路线进行。福利政策就是一个例证。当它刚出台时,也许遵循简单的直线思路——“缺啥给啥”,十分奏效。可是,久而久之,救济就成为一种穷人习惯了的获取,失业者不再积极渴望拥有一份谋生的职业,城市“底层”的涌现成了发展的讽喻,福利国家制度或福利思想失败。失败并不能单靠撤销政策就宣告结束。我以为,这种非预期结果的发生揭示了一个问题:单一的经济发展、经济援助已经无济于事,如果说任何政策都是某种理论研讨的实际结果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结构解释面对种种失败的反贫困策略已经感到束手无策。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困现象,莫非本身并不单单是经济现象,而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这种反思的依据在理论上或许出自这样的逻辑推理或假设:一方面,当结构变迁时,往往文化的变迁滞后于结构。换句话说,观念的转变落后于物质和技术的变化。这种文化上的滞后,形成一种阻力,阻碍着结构的变迁。另一方面我们也说过,贫困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亟待克服的现象,或作为发展的产物,同样属于发展的阻力。那么,两方面的结合,是否可以认为:作为阻力的贫困问题,恐怕其中更多反映的就是固有文化对结构变化的阻碍呢?如果答案能够成立,我们就可以说,当结构造就出既定的贫困时,我们用文化因素去解读贫困应该颇具说服力。

不管上述推理是否能够成立,从20世纪60年代起,已有许多学者开始尝试着用文化解释来理解贫困。

文化取向的解释

贫困文化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一批经典的论及贫困文化的书籍相继问世。其中,刘易斯(Oscar Lewis)的《贫困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实录》、班菲尔德(Edward C. Banfield)的《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哈瑞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类美国》,通过来自墨西哥、意大利和美国等不同社会的经验资料,共同构筑起贫困文化的概念架构。他们的出现和后来者的许多著书及争论,都确实使当时的贫困研究,尤其对当时激烈展开的有关“城市底层阶级”的讨论,实现了一次解释框架的转向,这就是:从结构解释转向了文化解释。

人类学家刘易斯首先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在题为《贫困文化》一文中指出,“贫困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模型的标签,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与理性的社会亚文化。它表达着“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也表达着“在阶层化、高度个人化的社会里,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应”(Lewis, 1966: 215)。贫困亚文化的存在,一方面是穷人在社会强加的价值规范下无法获得成功,而采取的种种应对挫折和失望的不得已选择。另一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穷人,他们完全心甘情愿生活于自己的文化圈。无论是哪一种存在,刘易斯以为:“一旦穷人具有了阶级意识,或者积极于组织起来,或者能够以国际化的观点看世界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有贫困文化了,尽管他们可能还是穷人(Lewis, 1966: 215)。从这层意义上看,贫困亚文化可能是主流文化中的暂时现象。但是,刘易斯在他的另一表述中又偏偏强调了文化价值的中心地位,他说:“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倾向于永恒。棚户区的孩子,到6—7岁时,通常已经吸收贫困亚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Lewis, 1966: 188)。这样,贫困亚文化对大社会的拒斥、隔绝的关系,在刘易斯眼里似乎又是一个绝对的概念。

班菲尔德认为,利己、家庭本位、排斥集体合作的观念和行爲,是“非道德性家庭主义”的伦理藩篱,亦即贫穷文化在乡村社会中的集中体现。他在《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落后乡村 Montegraneesi。那里的村民们甘心作“家庭的囚犯”去获得一些即刻的报酬,接受现实的和眼前的安排。在进一步阐释这种伦理的原则和起源之后,班菲尔德分述了“非道德性家庭主义”下的三种贫困事实:(1)高度死亡率之下的孤儿及普遍的继父母式的家庭生活;(2)土地的占有决定了村民的阶级地位和政治表现,大量无地的农民处于最低层;(3)缺乏扩大家庭制度。这里,班氏告诉我们一个也许是颇具启示的解释框架:结构因素引发了这个落后村庄的伦理基础——“非道德性家庭主义”,亦即村庄独有的贫困文化;反过来,作为整个村庄本质的“非道德性家庭主义”,又以其自主性的表现,进一步影响这个贫困村庄的发展,制造或加深了贫困。班菲尔德的这种辩证的思想,虽然贯穿在这部书的始末,但他真正要强调的是:“非道德性家庭主义”是这个村庄所有人(包括上层和下层阶级)长期共同遵奉的价值伦理。像刘易斯一样,班菲尔德也相信,“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改变贫困的可能,只取决于外群体的力量”(Banfield, 1958: 156)。

一般认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贫困之战”是随着约翰逊总统的就职和哈瑞顿的著作《另类美国》的问世真正开始的。哈瑞顿的这本书取材于整个美国社会。穷人,在哈瑞顿的

笔下被描绘成“另类美国人”，其中的意思乃不言而喻：如果“我群”代表美国的主流，那么穷人作为“他群”必然为社会的非主流，而且一定存在有别主流社会的亚文化。哈瑞顿说过，“在美国，穷人是一种文化，一种制度和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家庭结构不同于社会的其他群体，没有父亲、较少的婚姻关系、早孕且有混乱的性关系，大多数穷人的孩子不懂得需要稳定的、正常的爱情关系……哈瑞顿在书中，也像刘易斯·班费尔德一样，描述了美国当时的贫困状况，并对贫困现象的解决抱以极度悲观的态度。所不同的是，他强调贫困文化的永久性格，似乎比前两者更胜一筹。他说，“存在着两种说法：‘穷人沦陷在一个堕落的怪圈中’；或‘穷人生活在贫困文化中’”，不管是哪类说法，他们都是一个稳定的、不思也不可能变迁的群体。他们一旦投入卑微父母的怀抱，进入一个落后的国家或社区，选择一个错误的工作场所、一个被歧视的种族，或误入一个伦理环境，就只能耳濡目染，成为那种环境中赞美的道德和意志的楷模。他们中的大多数从此再没有机会走出这个美国的另类群体”（Harrington, 1962: 23）。很明显，在哈瑞顿的话语里含有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之观念。60年代的许多研究支持这一较为悲观的观点。

情境适应理论

面对结构的变迁及新的结构机会时，几乎每个人都有个调整、适应的问题。一方面存在着机会不等、无法选择或适应不当等因素造成贫困的可能；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明显地，原本在结构位置上占有优势的群体，会在文化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力量。毫无疑问，穷人不可能执掌社会的主流，他们可能的仅仅是对富人文化的屈从和顺应，按照富人们制定好的“游戏”规则、价值规范和行为标准行事。作为非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贫困者适应的快慢，或不适应而招致的反叛，都可能构成贫困圈内特有的文化，引起人们的关注。文化解释大致给出以下子命题。

命题一：是社会反常，缺失价值整合，还是错位的意识？

在争执不下的有关“Underclass”的讨论中，许多人倾向于涂尔干的话语，将经济发展后城市底层阶级人口不断上升的现象解释为“社会反常”（Anomie）。意思是说，经济发展时期，整个社会处在严重的转型“失范”状态。这时底层人口的增长、底层人的反常行为，正是这种“失范”的直接反映。社会传统价值观念已经崩溃，新的价值规范尚处于酝酿阶段，在这样的空间里，填塞下了许多没有道德疆界的贫困事实和贫困者的反常。涂尔干提出“社会反常”之后，曾经非常担心底层人的反抗可能酿成与市民整体的冲突。为了减轻公众领域的冲突，他早年一直笃信结构的力量。他以为，只要组织起来，加强非个体的结构，就能够整合社会，以减少穷人的违法行为。但他晚期论著的观点，已经由结构转向了文化。他说：如果没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或信仰去联系起民众，个体更可能采取威胁社会整合的过激行为（Durkheim, 1951）。因此，就社会控制而言，他力主在变动不定的社会里，必须通过灌输一整套强调自律与勤勉的文化价值观念去控制穷人，以达到社会稳定。

与此类似，凯尔索看到：在18—19世纪的转折之际，维多利亚道德的兴盛年代，社会祥和，人心安宁。但二战尤其是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人的价值观发生改变，一种强调自我表现、个人权利的自由放任道德，取代了那种强调自律、公共责任的维多利亚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凯尔索认为，“面临规范的失却和调整时，许多原本不太遵从或适应规范的低收入群体，较之其他群体来说，更容易放弃旧有的规范。当穷人们迅速松懈对维多利亚规范的承诺时，他们的经济地位遭遇了社会许多其他部分无法想象的损失”。“维多利亚原则的下降，对整个社会至多为一

刺激物,但在贫民窟内,社会规范的弱化,加剧了底层阶级不幸的上升”(Kelso, 1994: 156)。

规范失落引发贫困及贫困人口的反社会行为,是以上陈述的要点。但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改革、变动的20世纪60年代,穷人的文化或态度会以如此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似乎对此颇有议论。早先,他们相信,穷人深受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因而不思进取,沦为下层;后来,他们认为,穷人不仅遭受文化规范的破灭及所谓的“社会反常”,而且遭受着一种意识错位,即遭受一种导致政治寂静教(17世纪一种基督教的神秘主义教派)的错误意识。涂尔干将文化视为提升社会整合的手段,马克思主义不同,他们更经常视文化为精英们用以维护其社会统治地位的一个重要源泉。比如,他们反对将维多利亚规范看成是“帮助穷人成为公民”的良药,他们相信,所有为社会所采纳的规范(包括维多利亚规范)都是用来安抚和剥削穷人的。通过规范的神秘去驯服大量的社会底层,让他们自律、安分守法、勤勉工作,目的是限制社会底层人向上流动的机会。换句话说,在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眼里,“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的维多利亚规范,只不过是强加于穷人的政治制度,它时刻保证着工人阶级及其他底层人不可能威胁精英的统治地位”(Kelso, 1994: 165)。

同样针对规范,涂尔干的“社会反常”、凯尔索的维多利亚规范的失落,指的是规范松绑之后的贫困增加现象,呼吁的是规范的回归;相反,马克思主义者指的是规范强加给了穷人,进而禁锢了他们的贫困,使贫困继续,呼吁的是剔除规范,方能解救贫困。不同的思路各自有其盲区:前者不能解释为什么“失范”必定出现贫困;后者则不能在“安抚穷人”的口号下,解释清楚穷人反叛行为增加的趋势。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穷人被规范关闭在他们的地位圈的“死寂”,没有注意到他们在城市社区其他方面的“活跃”。

命题二:是期待与现实的差距,心理紧张的加剧,还是文化资本的缺乏?

甘斯在他的一篇题为《贫困研究中的文化与阶级:一项反贫困的探讨》的文章中,一反他自己以往的结构功能主义立场,从文化的角度论及了有关穷人在富裕社会中的文化适应问题。甘斯将文化分为行为文化和期待文化。按他的观点,行为最初起因于对现存环境的适应。人类的不少行为仅仅是对现实生存环境的反应,并随之变化而变化。可是,有一些行为模式被内化为规范后,环境的变动并没有也无法改变它们。甘斯称这类行为是“行为文化”,其中内化了的规范就构成行为之原因。而适应某种情境又必然受适应者本人“期待”的影响,期待的强度及其持久性经常各不相同,就构成所谓的“期待文化”。那么,在甘斯那里,“所谓的文化,是那些引起行为、维持现存行为,又鼓励未来行为的‘行为规范’和‘期待’的混合体,它独立于情境刺激和情境限制而存在”(Gans, 1968: 212)。甘斯用这样一种文化观念,把我们带进了他所独具的贫困解释:(1)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富人的期待和行为规范之间的差距远远小于穷人,因为富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期待拟订社会的规范准则,并强迫穷人遵守。在这种状况下,穷人或者具有与富人不同的期待,或者不能内化富人强加于他们的行为规范,即使具有一样的期待、接受一样的行为规范,也会缺乏机会。无论哪种可能,穷人在期待与现实无法一致的情况下,只能发展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发展自己的亚文化。在甘斯看来,这既属迫不得已,又在情理之中。(2)将甘斯的“行为文化”归为大系统文化的一部分时,某种行为模式的原因就被描述成了“文化”,这时候存在一个倾向,就是将这种行为模式和支撑它的规范看成是抵抗变迁的文化。我以为,甘斯向我们点拨这一点的涵义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在考察文化与贫困的关系时,最重要的是去发现穷人面对新机会、新的变迁场景时,是否能迅速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什么是来自于被称之为“文化”的约束和阻碍?显然,从穷人的行为模式入手,看其“内化的行为规范”和

“期待”，就差不多捕捉到了贫困现象中的文化因素。(3)依甘斯的观点，不仅穷人内化怎样的规范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其内化的程度也相当不同。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存在一些规范，它们并不能深入，仅仅属于口头“文章”；另一个极端是，某些规范被植根于人格结构中，一代代地传承，成为一种文化(比如，刘易斯等论述的贫困亚文化)。甘斯所强调的是，处于两极之间的规范内化程度的变动和它最终的跃迁。他相信：“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段，我们能够知道，一些行为呈现着，一些行为不出现；也可以明察某些行为规范的內化比另一些更长远。而在一个变动的环境里，虽然我们不明白哪些行为规范会改变，哪些暂时不会改变，但任何行为规范，不管它植根得浅还是深，最后终将结束。因为文化一定是对经济和生存环境的一个反应”(Gans, 1968: 210)。如此，在甘斯的带有文化意味的文字里，我们读到的贫困不再有永久的意蕴，虽然穷人的社会适应过程充满荆棘。

穷人是否内化大社会给定的价值规范？这一问题的答案，在刘易斯等人的“贫困文化”的叙述里是否定的；而在甘斯的分析中，它介乎“可能是”(Maybe yes)和“可能不是”(Maybe no)之间；但是，在自由派秉持的另一个文化解释——紧张理论中，回答却是“完全肯定”的。由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紧张理论”，其主要的思想是：底层阶级的自我消极行为，起源于穷人自己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承诺，而不是大社会的排斥。紧张理论认定，穷人已经完全内化了整个大社会的价值，但高度层级化的社会，使他们不能实现或达到目标，因而导致心理紧张。为了减轻心理紧张，穷人需要通过反常行为来释放压力，通过犯罪行为表达自己对社会的失望(Merton, 1938: 672—682)。简言之，紧张理论认为：穷人内化了大社会的价值观，就有了他们的承诺；因为承诺不能兑现，他们有了紧张，也因此有了“反常”。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新作《世界的贫困》是他研究穷人的实录。穷人的窘迫往往源于他们没有选择；而没有选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穷人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必要的文化资本。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既指由人们长期内化的禀性和才能构成的生存心态；也指由合法化的制度所确认的各种学衔、学位；还指那些已经物化的文化财产。根据不同的指代，布迪厄在分析不同阶级出身的儿童受教育机会和就业不平等状况后指出：权力决定着教育制度，决定着文化资本的分配和再生产。现实中，无论怎样的社会，当教育制度被视为争夺和维持统治阶级地位的重要工具时，文化资本潜在的不平等分配将是必然的。作为社会低下层的穷人，历来只可能成为教育制度的牺牲品；而那些掌管制度的精英阶层定会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因为他们把持着支配文化资源的权利。之后，布迪厄还特别指出：“扩大英才教育的最初得益者，是那些原本就具有文化资本的专业家庭出身的孩子”(Swartz, 1997: 288)，也就是说，作为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明显具有代传递特征。对于穷人来说，我以为，一个合乎事实的推理是否应该这样：原本缺乏文化教育的穷人，其孩子的受教育程度亦将是低下的。教育程度相对低下的历史，使他们积淀或内化了的适应主流社会的才能也相当贫瘠，或其内化的禀性迥异于社会主流文化，因而他们的生存心态、他们所能建构或鉴赏的文化财产都绝非主流社会能够认同和接受的。于是我们说，穷人在文化资本的三层面上都是匮乏而不入主流的，他们贫困因为他们自己别无选择。

命题三：是歧视，孤立，还是排斥？

这组命题下的论者采用了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双重视角，但结构与文化的分野仍然清晰可辨。文化解释的落脚点是社会态度如何影响贫困，而结构解释则从制度、转型和流动等方面探索这些社会态度的最初原因。

持歧视观点的美国自由派领袖哈瑞顿认为，种族歧视是贫困的最主要原因。他认为：“美

国黑人遭遇的社会经济崩溃,是白人精心策划、种族歧视及其病态心理状态的结果”。而且普遍存在一个“种族主义的经济结构”,“它并不是国家的主张,而是一个植根在劳动市场中的历史的和制度化的职业等级制度”(Harrington, 1984: 140)。60年代,约翰逊政府曾通过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努力去纠正种族歧视,呼吁减少种族偏见可以有效地降低社会贫困率。然而,民权运动之后,二三十年逝去,黑人的贫困率反而从1969年的32.2%增长到1991年的32.7%。并且,新的统计资料显示,现在大约2/3的贫困人口是非种族歧视的对象——白人。由此,人们质疑“种族歧视”是否依旧为贫困的主要原因?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许多政策分析家将歧视看作一种文化现象。他们认为,歧视出自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信仰,是绝对排外的种族中心主义。在他们看来,反黑人情绪来自欧洲的原始情感,反映西方的文化中心主义。美国学者则认为,种族偏见起源于美国历史上对黑奴剥削的本土发展历史,一旦具有了这种剥削关系,偏见就获得了它的生息之地,久而久之,为白人至上主义的态度和行为创造了一个强劲而又非理性的基础。因此,歧视深埋在美国社会中,黑人、少数民族将永久贫困。但莫代尔(Jan Myrdal)认为,美国社会的文化价值实际是缓冲种族歧视的,因为美国大众已经将美国人理想中的信仰和种族歧视的实践作区分,他们欲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所有人。

在美国,另一个与歧视观点相左的文化解释是从亚裔或犹太移民的崛起开始的。这一解释非常器重文化价值在移民事业成功中的作用。一些学者以为,亚裔人能够摆脱贫困、获得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踏入美国的最初动机仅仅为了挣钱后能够重返国土。正是这种“过路客”(sojourner)的地位或心态,使他们在适应美国文化的过程中,能够暂时忘却自己的享乐,异乎寻常地发奋工作、勤俭节约,具有甘担风险的创业精神。最终,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就了事业,也因此有了长期立足的能力。另一些学者以为,亚裔人和犹太人能够立足他乡的根本,并不在于他们特有的“过路客”的地位,而在于他们的文化传统。譬如,用他们原来固有的城市经商的传统,来解释他们成为企业家的品格。但赫兹波格(Arther Hertzberg, 1989)注意到,美国犹太人的历史亦是一个贫困的历史,他们并没有经商背景。类似地,大多数移居中国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农民,很少经商或管理企业的知识。还有一些学者相信,这些贫困移民能够成功地适应社会,因为他们拥有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如强调教育、努力工作、严明纪律等。可是,如果真是这样,人们又会质疑:为什么同是肩载这种优秀品质的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不能成功?凯尔索告诉我们,在本国的土地上,尽管他们具备这样或那样的优秀品质,但那只是潜于意识深处的不能实现的愿望。因为这些潜在的能力通常可能被其他因素所吞噬。如,传统的来自儒家思想的信仰,一直极度轻商,不免要抑制许多亚裔人的经商活动;再如,沙俄政策限制了犹太人的种种机会等等(Kelso, 1994: 85)。总之,很多族群在本土上常常没有办法去实现他们内在的价值和能力,只好背负贫困,背井离乡,选择异地去生存、适应和发展自己。凯塔诺(Harry Kitano)进一步指出:这些移民来到美国后,是两种文化的结合造就了他们的成功。具体说来,表面怀揣家乡传统文化的移民,又将美国人的信仰加以内化——努力工作、积极投身商业活动能够导致向上流动,他们“在一个既没有官僚压抑商业活动、又没有文化上否定企业活动的自由而宽松的的美国环境里,重塑了一个崭新的文化,那是他们的本土文化和新家乡文化的结合”(Harrison, 1991: 150—160)。这样结合而成的新文化,是移民成功适应社会的根本。

以上从“过路客”的心态、文化传统、传统价值观念和双文化结合四个方面,解释了部分移民能够在新环境里由贫困走向相对富裕的影响因素。无论哪一种解释,它们给我们的启示至

少有两点：(1)移民的贫困多半属于由迁徙引起的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贫困问题。(2)边缘地位的跃迁，依赖个人及群体的文化适应的能力和程度。因此，用文化解释去理解移民的贫困似乎颇具道理。

威尔森在 80 年代晚期的名为《真正的弱势群体：内城、底层和公共政策》一书中发展了他自己的社会孤立理论。他认为，发生在美国工业中心城市的贫困急速增加的现象，是都市内城各种经济变迁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构变化是：伴随美国的经济转型，许多重工业企业从城市迁往郊区，许多中产阶级与工作阶层因此也移出城市。都市内城因此成为穷人集合的领地，一个社会孤立的(次文化)区域。威尔森以“集中化效应”一词指称内城居民(特别是高贫困率社区的黑人)的生活情境。他说，正是城市发展的错位，不仅在地理上隔离了贫困的黑人，限制了他们的机会——他们没有工作，或者不能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也因此心理、文化上孤立了贫困者。穷人因此产生了贫民窟独有的生活态度和一系列与主流文化相悖的道德规范，即产生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危害城市居民的病态文化。内城穷人的贫困是经济转型造成“社会孤立”的结果(Wilson, 1987: 60)，因此，是社会隔绝了穷人，抛弃了穷人。

走出威尔森的论述之后，似乎昔日主要在美国的有关“underclass”的讨论已经被欧洲人兴起的社会排斥理论所代替。社会排斥理论(Byrne, 1999)相信：社会各方面的变迁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排斥。排斥会作为一个社会的总体力量压迫某些个体或群体，制造出贫困；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对人群做出自然的抑或人为的类别区分。如，由经济排斥、政策排斥、认同排斥和空间排斥等，造成了富人与穷人、阶级或阶层、女人和男人、公民与非公民的区别。其中，认同排斥是人们内在的、自我的选择，多受文化因素的支配，它实际存在于任何一种属于经济关系的排斥之中，像一种语境、一个支持背景，内在地支撑着那些属于外显的排斥：一拨人排斥另一拨人。柏尔纳认为，“排斥是‘社会’作为整体而犯的过错，是贫困的直接原因之一”(Byrne, 1999: 2)。

贡献与盲点

相对于结构解释较为零散的特性来说，真正系统地描述与解释贫困现象的理论当属贫困文化理论，以及后来在对贫困文化理论的反省中诞生的若干“情境观点”。曾经有人将 60 年代以后的贫困研究进程分为三大讨论阶段：贫困文化的讨论、底层阶级的讨论和社会排斥理论的讨论。所幸的是，这三部分内容大多被囊括在文化解释中，足见文化解释于贫困研究之地位。

将刘易斯、哈瑞顿和班费尔德的贫困文化理论当作整个贫困研究理论的起始，一直是人们的共识，因为这些理论对 60 年代以后的贫困研究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表现在不仅其后的一些理论的形成经常借用它们的意涵，而且一些理论的形成也差不多是为了反驳贫困文化理论的缺陷的。例如，情境观点基本是在反思贫困文化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在强调贫困特征时具有很大的类似性，可是在特征是否可能改变的问题上却不尽一致。贫困文化观点更倾向永久的保持特征，而情境观点则多持变化的态度。

贫困文化观点被提出后，确实受到美国社会的广泛注意，并影响了 60 年代美国“反贫困战”的具体实施。但相应地，这种文化解释的观点也遭到其他研究者的激烈抨击。这些批评包括研究方法上的缺失、贫困文化概念的含混不清及逻辑上的矛盾、研究资料的不恰当，以及理论背后的价值预设多少潜藏着对穷人的歧视或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等等(Valentine, 1968)。一些学者认为“贫困文化”事实上并不足以被称作文化，充其量只能被当成某些行为特征，其形成原因是穷人适应外在社会情境的结果，并非穷人自身的错误。也就是说，贫困并非穷人自己的选择，而是穷人没有选择的机会。

我认为,这些批评固然有它客观的方面,但亦存在着某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结构可能是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可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考虑其中必然存在的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的抑或群体、家庭、个人的价值观和态度,早已通过社会化过程内化于人们的心灵深处,又遍布在生存环境的各个角落。这种深入和遍布,决定了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和反映着文化特征。以我之见,即便是最具结构解释意义的制度因素也无法摆脱文化影响力的控制。这不仅因为作为制度的制定者一定会带有文化因素的主观裁夺,而且制度本身也一定是基本贴近或反映当时当地的文化环境的,甚至如果将制度作为一种规范的话,它也可以隶属于文化的范畴。另外,受甘斯的启发,我以为,底层人分享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渴望的情况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但现实中,存在着许多这样的问题:“期待方面的阶级相似性无法解决在文化上是否存在阶级差异的问题。人们可能分享共同的期待,但同时又在通过自己的文化组织通常的行为模式方面保留着根本不同的方式”(Hannerz, 1992: 23)。最明显的例子是,移民们总愿意居住在同一族的区域内,共享属于他们自己的已经习惯了的文化。在这种意义上,文化更像一套技能或习惯类型,而不是一套倾向或欲望。将文化作为习惯类型时,我以为,一个人在已经有了一种文化背景,又跨入另一种文化环境时,一定会有一段遭遇贫困、需要适应的日子,因为在那里可被接受的技能、方式和非正式的知识都是他所不熟悉的。于是,就适应文化环境的意义来说,对类似这样的贫困作文化解释相当重要。

第二个需要商榷的地方在于,贫困文化的若干著述的确曾经花费大量篇幅描述了穷人的行为特征,那么在结构与文化的争论中,不少人质疑:行为特征是否就等同于文化的问题?我以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由来已久的争论。弄清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审视文化与行为的关系。韦伯认为,人类受物质和观念利益的共同驱动。观念的利益,诸如渴望免于地狱之苦的期待,也是目的取向的,源自象征现实。韦伯在他著名的“扳道工”(Switchmen)比喻中说过:“不仅物质和观念利益都直接控制着人们的行动,而且,由‘观念’创造的‘世界的意象’像扳道工一样,常常决定着受利益动力驱使的行动向何方而去。物质利益是行动的引擎,它驱动着人们向前,但是观念则决定着人类寻觅到达的目的地,以及到达的手段。帕森斯采用了韦伯的模式,但却降低了它的解释力。面对经济学的理性模式——行动者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者的观点,帕森斯的“行动的自愿理论”描述了这样一种行动者,他在一种情境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行动的手段和目的的常规规律的控制(Warner, 1978: 121)。根据帕森斯的观点,文化传统提供了价值取向,提供了一种界定为“共享的符号体系的某种成分”的价值,“这些价值可以作为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取向中做出选择的尺度或标准”(Parsons, 1951: 11-12)。这样,文化通过这种指向某些目的而不是其他目的的价值来影响人类行动。毫无疑问,文化解释假设:所有的行动最终都受控于某种手段一目的框架,文化通过限定人们的所思所虑塑造人的行为。那么,行为特征反映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必然的。

第三个需要商榷的是,很多人指责贫困文化论看似一部体恤穷人的叙述,但叙述者的实际姿态却在另一个频道上:穷人即懒人;穷人一辈子或世代代都将是穷人。一方面,理论上我们相信,如果能在文化语境中解读贫困的话,该贫困的持久性一定远大于结构解释里可以看到的某些贫困现象。因为能够称之为文化的东西,一定有年头的积累。结构可能造成贫困,一些是可以在较短的期限内通过努力、通过措施加以排除的;一些则可能持续,而且出现贫困文化的症候。我以为,我们研究贫困应当注重后者。我赞同刘易斯的观点,“减少物质贫困本质上不可能减少贫困文化,它是一个完整的生活方式”(Lewis, 参见 Moynihan, 1968: 198)。正因为

此,研究它才会显得丰满而颇具社会学(非社会工作)味道。而以往的单一政策性质的贫困研究所导致的“反贫困战”、“解脱贫困的政策”的失败,以及措施无济于事等等,也许与那种只见“树木”(物质贫困)、不见“森林”(贫困文化)的狭小思维方式有关。另外,实际上我们看到,以刘易斯为代表的贫困文化理论,虽然一再强调了贫困因文化因素的介入而表现出长久之特征,但在他们晚期的著作中,尤其刘易斯已经修正了家庭在贫困文化代际传递机制中的重要性,注意到贫民所处社会结构对贫困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比如,他建议穷人如果能组织起来,以国际性的观点看世界的话,将有助于他们脱离贫困文化。

就情境观点里包含的若干理论而言,它们的贡献表现在对贫困研究产生的后续影响方面,尤其是对研究底层阶级行为的影响、对弱势群体文化适应的影响,以及对贫困文化理论的反驳方面。这些研究大都注重文化的影响,较少触及结构条件的限制问题。其主要的理论盲点在于,它们之中的某些观点过于简化了环境和行为两者间的关系,人们并不会自动地顺应环境的变化。就像甘斯所说,行为模式、规范与期待的发展是适应现存的情境而来的,但并非情境改变,规范(行为模式或期待)就会随即反应而改变,两者间存在滞差(lag)。在甘斯眼里,文化是行为规范与期待的产物,它影响行为,一些行为是随情境的改变而变的,有些却非如此。相对那些只反驳贫困文化的不合理处,而未能提出具体的理论架构的观点来说,“期待与行为模式”的分析似乎较有见地。

结 语

上述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在以下4个问题上对贫困问题给予了不同的理论解释和答案。

第一,在对贫困现象的描述方面,结构解释注重贫困的客观状态,认定贫困是一种客观拥有的匮乏状态:收入、职业、权利、地位、市场机会的缺乏。文化解释强调贫困是一种特征:贫困群体的价值规范和行为特征(如刘易斯指出的贫困生活方式的诸多特征)、群体的态度(如威尔森的社会隔离)、主观心理感受(如默顿的紧张理论)等特征。

第二,就贫困现象产生的根源而论,结构解释较注重经济财富的研究,明显偏向于那些由制度或政策派生的致贫因素:市场机会、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种族主义、结构变迁等等。文化解释则关注那些主要由规范衍生的穷人们已经习惯的内在因素:个人的动机、信仰、生活态度、行为特征和心理群像等等。具体到穷人失业的问题时,结构解释认为是穷人缺乏平等的竞争机会、缺乏技能训练;而文化解释认为是穷人缺乏求职的动机、缺乏必要的文化资本。前者强调外援要素,后者呼唤内在驱力和内在的变迁。

第三,在发生贫困之后谁应该受责难的议题上,结构解释明显倾向于将责任外推。被指责的对象可能是国家、社会、市场和居住环境,也可能是政府、有权者、外群体及其他人。而文化解释,早期的贫困文化理论,多半将责任推给穷人,认为穷人应该对自己的贫困负责;但晚期(70年代后),在有关底层阶级的讨论中重新兴起的文化解释(文化适应过程的解释),如涂尔干的社会反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错位、甘斯的期待与现实的距离、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威尔森的社会孤立等等,则从社会规范的发生、式微,从社会态度,从穷人本身文化资源的欠缺等多方面,推导了一个责任首先归罪于社会、社会转型,然后检讨穷人偏差的适应能力的逻辑,也就是说,社会和穷人将共同分担“贫困责任”。

第四,就贫困现象会否持续长久问题,结构解释的观点是,贫困仅仅属于暂时的经济现象。因为它相信,外在因素是致贫的原因或根源。而一切外在的、强加于人的因素,相应于内在的、

植根性的因素来说,更容易被人为地改变,被克服。至于文化派,尤其持贫困文化理论的学者始终认为,贫困是一个永久的或较为长期的文化现象,是一种具有代际传递的、一个具有福利依赖的永久性贫困。尽管后来有诸多的外在的文化规范强加于穷人的说法,而且晚期的刘易斯已修正了贫困文化代际传递机制的重要性,但是不管怎样,文化因素较之结构因素,对穷人的影响在时空的持续或逗留上,一定更漫长、更深入一些,因为文化规范的吸纳和吐故需要相当的时间作填塞。当然,作为结构解释的特例,甘斯的“贫困正功能”以及“经济力导引贫困”的说法,似乎持“贫困现象具有永久性特征”之调,但依我见,这种结构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某一群体或某一个人将永久或持续陷于贫困的泥沼,而是意涵贫困作为整个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将无法根治,并可能无所不在。

总之,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在面对相同的议题和相同的事实时,往往有十分不同的解释,像一块钱币的两面,相互独立,自成一面,又浑为一体。在这层意义上来说,忽略任一面的解释,或倚重某一面的解释都会有失偏颇。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两大理论派别之间也有诸多相通和相似的地方。例如,虽然甘斯的贫困功能论和马克思的制度论属于结构的观点,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论属于文化的观点,但得出了相同的研究结论——贫困是社会所必需的。甘斯从功能角度阐释贫困存在的必要性;刘易斯以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传递强调贫困现象的持久性;马克思则说,是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贫困。

几点思考

梳理结构和文化两种不同取向的解释时,我们总希望从中获得一些孰是孰非的判断,其实这种期待不仅不现实,而且不必要,因为每一种解释都有它一定的道理和功用。但我们却可以从梳理中对两种解释理论的适用范围作大致的判断。

判断的第一前提是:在结构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是结构靠实力作为基础而引发了对文化的支配。将这一思考用于贫困研究时,我们说,在社会结构位置上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或个人,必然要对弱势群体或个人实现文化上的全面统治。统治的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穷人接纳了富人强加给他们的文化,却不能享有富人享有的财富、地位和权利,在一种扭曲的理性文化中求生。第二种可能,穷人失败于对主流文化的接受,生活在自己的贫穷文化中。第三种可能,移居的贫困者,从一种文化跨入另一种文化,在“边缘文化”中度日。不管出现哪种结果或哪种可能,它们首先昭示的一个理论假设是:当结构造就出既定的贫困之后,我们需要倚重文化解释,尤其对较长时期的贫困现象。理由是,既然结构引发的文化支配不可避免,那么每一种由结构使然的社会现象,包括贫困现象,都必然打上文化的烙印。反过来说,以文化支配力去度量结构位置,同样不失为一种恰当的研究方法。

判断的第二前提是:结构力引发文化支配之后,文化又具有自主性。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宣传”、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以及布迪厄的“符号支配”等都认真强调了这种文化的自主性。在贫困问题的研究领域,最鲜明反映文化自主性的是贫困文化理论,它以贫困亚文化的不变应社会结构之万变,将贫穷文化因自主而获的霸权推延到了极致。在“文化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概念框架下,我们可以归纳三种用文化去解释贫困或解释发展的场景:首先,面对结构变迁,我们可以用文化解释行为(包括贫困行为)的持续性。譬如,移民在新环境下的行为特征受传统价值观的干扰。其次,在相同的结构场景下,人们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这时,我们可以雇用文化解释。相应的,当面对相同的发展条件,却有差异的发展结果(如一些人或地区富裕,另一些人或地区贫困)时,文化解释亦颇为得道。第三,我们可以作一个或许直觉上很有道理、但理论

上显得空泛的假设:文化还代表着特殊群体里任何可观察到的生活方式的连续性。这一假设与前述“行为持续性”看似相同,其实,前者是在结构变迁的环境中看行为的持续性;后者则在某特定的群体中看较为恒定的生活方式。

判断的第三前提是:在稳定和非稳定的两种结构场景下文化的解释力不同。在稳定的生活场景中,因为文化代表着这种生活的持续性,文化与生活其中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价值观念基本就是人们组织和行为模式的直接源泉。所以,在稳定的境况下,文化解释力是强大的。在非稳定的生活场景中,结构变迁是剧烈的,而文化变迁相对滞后。文化角色处在维持现存行为方式和建构新行为方式的搏杀、交织和变动中。在变动中或多或少存在着稳定的生活场景,存在着维持稳定的现存文化,而处于变动时期的个人、群体或社区又不得不被涵盖在建构新行为方式的努力中。此时,对变动的、不确定的行为表现,文化解释力显然较弱。我们从梳理贫困理论的过程中知道,在变迁或发展的环境里,贫穷是增加的,文化解释对此做出了两种视角的分析:一是由变迁中行为或生活方式的持续性去解读贫困文化;二是在新旧行为方式的交替中解读穷人的适应问题。

因此,真正理解贫困,需要文化与结构解释的结合。其实,任何结构取向的制度解释里一定会包括文化因素;而文化取向的贫困文化解释又或多或少有制度的约束因素。一个事实是,如果制度不考虑现时现地的文化因素,制度本身就容易受挫以致失败;而能够称作文化的部分,它一定具有经济制度的基础,否则,文化的支配力不会如此强盛。另一个事实是,一方面无论是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地方,还是在其程度较高的区域,贫困层总以一定的位置、一定的规模存在于结构中,重视结构因素的解释是必然的;另一方面,贫困文化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我们不得不考虑文化解释。两种解释并蓄的模式,不仅是以往研究提供给我们的范例,同时也被经验事实所支撑。但是,两种解释并存不等同于两种解释并重,差异般的、时序错落的解释可能是合适的。

参考文献:

- 包亚明主编,1997,《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
- 康晓光,1995,《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1972,《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 世界银行,1990,《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
- 亚当·斯密,1972,《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 Alcock, P. 1993. *Understanding Povert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Banfield Edward C. 1958.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Bauman, Z. 1987, "From Here to Modernity." *New Statesman*, 25 September.
- Bell, D. 197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 Bessis T. 1995. *From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Bourdieu, P. 1993.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wl, S. & Gintis H. 1976.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 Byrne, D. S. 1999. *Social Exclusion, Buckingham: Open of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r of Andre Gunder Fran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Davis K. & Moore, W. 1988,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

- Durkheim, E. 1951, *Suicide*, New York; Free Press.
- Fege, Zs. & Miller, S. M. (ed.) 1987, *Dynamics of Deprivation*, Hants; Gower.
- Gans H. 1968 *The Urban Villagers; Group 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ian-Americans*, New York; Free Press.
- 1979 “Positive Function of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 Hannerz U. 1992, *Cultural Complexity; Studies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ea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arrington, Michael 1962, *The Other America;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 1984 *The New American Pover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on Of Canada Limited.
- Harrison, Lawrence E. 1991, *Who Prospers; How Cultural Values Shap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ucc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 Hertzberg, Arthur 1989, *The Jews in Americ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elso, William A. 1994,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the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Lanski G. E. 1966 *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Lewis Oscar 1959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66 “The Culture of Poverty.” *Scientific American*, 215.
- Madanipour, A., Cars G., & Allen, J. (eds.) 1998, *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an Cities*,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 Merton, Robert K. 1938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Miller, W. 1958 “Lower Class Culture as a Generating Milieu of Gang Delinquenc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XIV.
- Moynihan, Daniel P., ed. 1968 *On Understanding Poverty (I)*, New York; Basic.
- 1969 *On Understanding Poverty;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 Parsons, T. 1951,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 Rainwater, L. & Yancey, W. (eds.) 1967, *The Moynihan Report and the Politics of Controversy*, Cambridge; MIT Press.
- Scott, J. 1994 *Poverty and Wealth; Citizenship, Deprivation and Privilege*, London; Longman.
- Sowell, Thomas 1981, *Markets and Minor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Swartz, David 1997,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No. 181,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1”.
- Valentine, Charles A. 1968 *Culture and Poverty; Critique and Counter-Proposal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amer, R. Stephen 1978, “Toward a Redefinition of Action Theory; Paying the Cognitive Element its Du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 Waters M. 1964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World Religions.” in *From Max Weber*, edited by H. H. Geth &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Key Sociologists; Daniel Bell*, New York; Routledge.
- Williams, R. 1983, *Keywords*, London; Fontana.
-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78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志敏